

情愛上海：名妓、文人與娛樂文化

連 玲 玲*

書 名：*Shanghai Love: Courtesans, Intellectuals, 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 1850-1910*

作 者：Catherine Yeh (葉凱蒂)

出版時地：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頁 次：x+430 頁

自從賀蕭 (Gail Hershatter) 及安克強 (Christian Henriot) 於 1997 年分別以英文及法文出版關於上海娼妓的著作，¹ 娼妓史再度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不但再版相關史料，² 也吸引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繼續從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1 Gail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Christian Henriot, *Belles de Shanghai. Prostitution et sexualité en Chine aux XIXe-XXe siècles* (Paris, Editions du CNRS, 1997). 後者另有英譯本：*Prostitution in Shanghai. A Social History, 1849-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 例如 1935 年王書奴所著、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中國娼妓史》，從 1988 年以後，至少有四家出版社重印過。

事娼妓研究。³ 任教於波士頓大學的葉凱蒂教授，花費將近 20 年才完成的新著《情愛上海》一書，採取不同於賀蕭及安克強的視角，重新詮釋清季上海妓女於建構娛樂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與文人的互動情形。賀蕭把討論重點放在知識分子及國家對娼妓的態度，她認為在層層的論述中，相對靜默的娼妓成爲「他者」，因而娼妓問題其實是權力支配者展現意志的一種論述工具，不論是社會改革的主張，或是規範娼妓的法令，最終目的均在於建立「現代國家」。儘管賀蕭承認「下屬階級」(Subaltern) 有發言的可能性，然而知識分子及國家仍是最主要的知識生產者，他們掌握了再現娼妓問題的關鍵。相較於賀蕭的「後結構主義」色彩，安克強則採取「傳統」社會史的研究取徑，閱讀大量的警政及外交部門檔案，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審視上海娼妓——它代表的是蘊涵巨大利潤的市場，以女性身體爲交易標的，尤其到了 20 世紀，娼妓業更直接面向普羅大眾，娼妓的階級界線也變得模糊。妓女的極度商品化及情慾化，複製了不平等的性別關係，同時女性也在各種方式的剝削下，帶著從屬地位的文化烙印。

雖然賀蕭與安克強的研究取徑大相逕庭，然而他們均把娼妓定位爲父權制度下的「受害者」——不論是女性身體受到摧殘，或是女性工作權(若「賣淫」可以視爲一種工作權的話)受到剝奪。葉凱蒂所描繪的晚清妓女，則呈現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圍及性別關係：她們不但是精打細算、錙銖必較的生意人，更諳熟人際關係技巧、在許多場合均能左右逢源。換言之，葉凱蒂筆下的晚清妓女，完全能掌握當時租界的政經優勢，並且能夠在上海灘呼風喚雨，她們甚至還可稱爲 19 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內憂外患下的獲利者；這完全打破以往對娼妓的印象。此外，作者並不將娼妓業視爲一種「社會的邪惡」(social evil)，而是形塑娛樂文化的重要環節，一方面重新審度娼妓業在城市發展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提醒讀者娛樂業在城市文化形成過程的重要性。

3 晚近的著作包括邵雍《中國近代妓女史》(2005)、張耀銘《娼妓的歷史》(2004)、大木康《中國遊里空間——明清秦淮妓女的世界》(2001)等。

本書的副標題為「妓女、文人、娛樂文化」，這也是論述的三個方向。全書除了前言及結論外，共分為七章。第一至三章談的是妓女，從時尚、傢俱、禮儀、遊戲規則、命名等方面，討論妓女如何經營青樓文化。第四到第六章的重點在文人，這些游移於科舉仕途邊緣的讀書人，在近代媒體找到新的出路，藉著打造妓女的公共形象，建立其「報人」的身分及在上海文化界的位置。第七章則利用幾份不同的上海指南，探討娛樂業如何形構上海的特有面貌。

作為「現代性典型」的娼妓

要寫一部娼妓的歷史，一般都從一個女人何以墮入風塵開始，而大部分的答案都是「貧困」；葉凱蒂卻反其道而行。在第一章的開頭，作者是這樣介紹主角出場的：「從 1860 年代到 20 世紀初，上海名妓的儀態、衣著、及閨房裡的擺飾不斷成為眾所著迷的對象。」這段敘述也為接下來的故事定調：作者所呈現的上海妓女，是一群穿著光鮮亮麗、時刻受到矚目的美麗女子，她們對西方物質文化有著強烈的偏好，不論是衣食住行，還是娛樂活動，均沾染「洋」的氣息；也因此，她們成為展示上海租界文化的代表。這些新的角色使妓女在租界內取得新的身分認同：為了競爭，妓女砸下重金打扮自己並裝飾宅第，使她們更像是做買賣的生意人，而不是可憐兮兮的被剝削者；有些高級妓女甚至使用名片來介紹自己；同時她們也想盡辦法攀關係、拉交情，甚至在上海以外的城市「擴展業務」。在這裡，葉凱蒂用「獨立的專業人士」(independent professionals) 來描述上海妓女，從職業倫理的層次來看，也許不甚恰當；但以專門職業的角度而言，她們的確是具備交際手腕的經營者。

上海妓女的另一種形象是時尚領導者，花界所流行的服飾、髮型、傢俱、行為舉止等，都成為一般婦女仿效的對象。作者指出，晚清上海妓女特別熱衷戶外活動，舉凡逛公園、看跑馬、乘馬車等，這使得妓女取得前所未有的自由與公共能見度。她們的創意不但是打廣告的招術，也跨越了原有的性別規範與階級界線。最明顯的例子是妓女乘轎出堂差

時，令男僕手持寫著「正堂公務」字樣的燈籠，其陣仗和派頭與官員出巡無異——這在文人看來，是對國家權力體系及性別秩序最大的嘲諷與挑戰。娼妓大膽顛覆既有的社會規範，把女性在公共空間的可能性推到極限，因此她們可以說是城市新婦女的典型。

此外，上海妓女也是主動的話題製造者，這特別反映在「花塚」的建立上。就像許多商人一樣，上海妓女來自全國各地，其中客死異鄉者不在少數。為了解決流落異鄉妓女的身後事，某位人士提議在靜安寺附近建一墓園，安葬無主名花，並邀請滬上四大名妓負責勸募。明清以來會館公所為同鄉建立義塚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由妓女出面為業內姐妹建立義塚，殊屬罕見。此外，整個勸募事件，也突顯名妓間的競爭與衝突。花塚一案原由四大名妓之首林黛玉主其事，由四人分別將1600本捐款簿分配至各妓院，再由妓院向狎客募款，一段時間後再分別將捐款簿及款項收回。不過四大名妓中的陸蘭芬、金小寶卻對林黛玉的做法不以為然，藉著接受採訪的機會，對林黛玉的計劃提出批評。後來林黛玉被指控挪用公款，以致不得不讓出領導地位，由金小寶接管花塚一事。整個事件歷時年餘，雖然花塚在林黛玉手上建立，但最後得到領袖聲譽的卻是金小寶。妓女透過花塚事件，不但在公共媒體炒作話題，同時藉機擊敗競爭者，奪得花界領導的寶座。

葉凱蒂對晚清青樓文化的描寫，乃扣緊「現代性」的主題進行。儘管她對「現代性」未曾給予清晰的定義或範圍，但從她對妓女活動的敘述可看出，「空間公共性」是她所謂「現代性」的主軸。比起晚明及盛清時期的姐妹們，晚清妓女的確擁有較大的空間自由；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明清妓女（甚至一般婦女）就被困在私人空間裡。晚明以降江南旅遊風氣盛極一時，不但士大夫熱衷此道，就連婦女也藉著進香的機會，遊覽名山勝景。而妓女陪伴士大夫出遊的情形，更是司空見慣。根據當時方志的記載：「至今吳中士夫畫船遊泛，攜妓登山，虎丘尤甚，雖風雨無寂寥之日。」⁴ 換言之，明清妓女已具有相當的公共能見度；到了晚清，

4 巫仁恕，《奢侈的女人——明清時期江南婦女的消費文化》（台北：三民書局，2005），頁70。

妓女的戶外活動種類及頻率可能更多，但這種程度上的差別，是否就能當作「現代性」的指標，值得進一步的討論。

文人與新式媒體

本書的第二個主角是文人。文人一直是學術研究的重要對象，不單因為他們在政治文化的角色，也因為他們是知識生產者。不過本書作者選擇了一般所認為文人生活最「邊緣」的部分，即他們與妓女的關係，探討晚清文人的認同問題。

文人書寫妓女，並不是件特別的事；事實上，吾人對歷史上妓女的認識，大部分仰賴文人對妓女的記載。不過文人對妓女的描寫，不見得是如實的反映；更多時候，文人對妓女的歌贊與喟歎，是投射自身處境的產物。也就是說，文人的妓女書寫，可以看成其自我認同的表達。作者特別以幾個文人的妓女書寫為例，討論其與文人認同的關係，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蘇州文人王韜 (1828-1897)。1848年，王韜到上海謀生，後來進入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主持的墨海書館工作，協助翻譯聖經。除了翻譯工作，王韜也有不少著作，包括倡議變法自強的策論及遊歷各地的遊記。王韜也敏於地方風俗的觀察與描寫，對上海青樓文化的刻畫，尤令人印象深刻，曾編撰《豔史叢鈔》，收錄明清名妓故事的筆記雜文。根據葉凱蒂的觀察，王韜在1850年代及1880年代描寫上海妓女的方式很不一樣：在1853年的病中之作《海陬冶游錄》裡，王韜描寫名妓廖寶兒的坎坷身世，因家道中落，被豪賭成性的丈夫賣入娼門，雖遇上自己心儀的男人，卻終究因為丈夫需索無度，被迫與情人分開。到了1884年出版《淞隱漫錄》時，王韜筆下的妓女眉君及李繡金，不再是任由老鴿擺佈的可憐蟲，而是勇於爭取自身幸福的獨立女性。葉凱蒂認為，王韜寫的雖是妓女的故事，所表達的卻是自己的情緒。藉著對廖寶兒的同情，王韜不但感嘆縣城內的青樓文化被戰亂破壞殆盡，象徵著美好時光的逝去，也反映自己在異鄉（特別是外國人所統治的租界）的寂寞、無助與自憐。至於眉君與李繡金追求真愛的故事，透

露的則是王韜的「自信和掌控感」。王韜為何有偌大的變化？葉凱蒂認為是上海變了，身處其中的文人的社會地位也跟著改變。1850年代的上海租界還只是一片荒蕪待墾之地，到了1880年代已逐漸邁向世界級都會之路，租界在經濟及文化生產方面的領導地位，使居於其間的文人得以發揮相當的社會影響力，到了1890年代，租界文人甚至主導國家意識形態的走向。

不過葉凱蒂在論證上出現相當明顯的跳躍。首先，妓女書寫對文人認同的塑造，究竟扮演何種角色，這可能必須先對文人的著作進行通盤認識，然後分析其妓女書寫在整體著作中的位置，才能得到較客觀的評價。以王韜而言，他主要以改革言論著稱，⁵ 妓女書寫只是他等身著作的一部分，能不能代表他價值觀、甚至是塑造文人認同的來源，是值得再考慮的。其次，葉凱蒂把王韜前後期妓女書寫風格的變化，解釋成租界地位、乃至文人社會影響力的變化，也值得商榷。就王韜本人的經歷而言，他1848年到上海，1862年因太平天國之亂流亡香港，1867年底開始歐洲之旅，1870年返回香港，直到1884年才遷回上海，並終老該地。⁶ 換言之，王韜妓女書寫風格的轉變時期，他本人並不在上海，也因此很難斷定王韜妓女書寫風格丕變，會與上海租界地位有顯著關係。最後，葉凱蒂的討論中，租界似乎賦予文人相當大的優勢；然而租界的存在，同時也是文人認同焦慮的來源，很難想像具有民族存亡危機感的晚清文人如王韜者，能在外國人控制下的租界享有「自信與掌控感」。

如果說，王韜是以複製晚明「才子佳人」的情節來描述晚清文人與妓女的關係，那麼李伯元創辦以休閒為主旨的「小報」則代表另一種文人與妓女的互動模式。1896年初到上海的李伯元，創辦《游戲報》，專門提供娛樂新聞，而其最重要的資料來源便是腥羶話題不斷的花界。報紙的出現，相當程度地改變文人的生活方式及時間概念：看報開始成爲

5 關於王韜的改革家角色，見Paul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974]). 忻平，《王韜評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

6 關於王韜的生平大事，見張志春，《王韜年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編報的文人如李伯元者，在每日出刊的壓力下，必須在一定時間內完成寫作，也促使他們必須更有效地管理時間。李伯元就曾經在《遊戲報》刊登一則告白，因館務繁忙，他只在每天下午四點至五點之間接待訪客。這種對時間及工作量的規劃，可以說與現代企業的運作邏輯若合符節。

至於報紙文人與花界的關係，根據葉凱蒂的觀察，至少在李伯元的時代，報紙文人仍努力扮演「護花」的角色，這特別在「李萍香事件」可以看出來。李伯元與名妓李萍香過從甚密，經常在他的報紙上刊登她的詩作。爲了捧紅李萍香，李伯元甚至在《世界繁華報》舉辦名爲「經濟特科榜」的花選，內定李萍香爲狀元，並爲她編纂《天韻閣詩》一冊。縱使李伯元想盡辦法打響李萍香的名號，最終仍未能保護她，使之被迫離開上海。原來出身大家閨秀的李萍香與潘某私訂終身，同居於杭州，並鬻字爲生。後來李萍香因故離開潘某，墮入滬上青樓。當她逐漸成名，忽然潘某出現，向官府聲稱李萍香是他的女兒，並要求帶回。由於審訊間李萍香對潘某的指控未置可否，官府便飭令李萍香離開妓院。李在寧波待了一段時間後，改名換姓，重回上海，卻也只能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葉凱蒂認爲，李伯元對李萍香的報導呈現報人的矛盾：一方面李伯元想要維持有聞必錄的報人本色，另一方面又希望善盡恩客的護花責任，減少李萍香所受的傷害。因此李伯元爲李萍香事件寫了一則社論，把整個案件解釋成「紅顏薄命」的結果——一種屬於晚明對名花殞落的感嘆。可是從吹捧到悼念，文人的妓女書寫呈現在報紙這種公共媒體，妓女成爲可供大眾消費的新聞題材。文人利用小報將妓女推向市場，結果卻使得文人喪失對青樓文化的特權，而青樓文化也就離昔日被塑造的高雅品味愈來愈遠。

葉凱蒂對李伯元的研究，可以說開啓了近代媒體史的新視野。相對於她在海德堡大學幾位研究《申報》的同儕，她把焦點放在小報上。小報作爲一種歷史素材，經常引發爭議；許多人對小報資訊的正確性，多所保留，也因此甚少利用小報進行歷史研究。儘管小報上關於花界或戲曲界的花邊新聞，可能是難以查證的謠傳或虛擬的故事，但與小報相關

的社會文化現象，卻是值得探究的課題。在這一點上，葉凱蒂的著作起了帶頭示範的作用，她筆下的上海是個多采多姿的娛樂城市，而她所以能夠把上海的娛樂與消費描寫得鉅細靡遺、栩栩如生，相當程度上歸功於小報不厭其詳地報導妓女及伶人的一舉一動與裝飾打扮。同時像李伯元之流的小報文人也是有趣的研究題材，這些在科舉仕途不甚如意的「邊緣」文人，小報提供了一個舞台，讓他們不但可以在陌生的城市裡謀求生路，更找到了揮灑創意的空間。另一點則是葉凱蒂較少提到的，即小報的出版機制，包括印刷、行銷等技術問題。綜言之，晚清到民國時期小報如雨後春筍般的蓬勃發展，本身就是個值得注意的課題，不應該在城市史的整體圖像中留下空白。

城市娛樂與城市認同

至於本書的第三個主題「娛樂」，葉凱蒂以兩種敘述方式來呈現，一種是作為妓女與文人論述的底蘊，也就是把上海看成一座大型遊樂場，妓女與文人在其中同時扮演娛樂提供者及消費者的角色。大體而言，本書的前六章都以這種方式探討上海的娛樂生活，同時將娛樂作為妓女與文人的接合點。不過作者還試圖把娛樂提升至論述的層次，視之為形構城市認同的元素。人們透過對娛樂活動的敘述，表達他們對城市意象的建構，甚至包括對政治權力的抵抗。從這個意義來看，娛樂的重要性不在於它的「有趣好玩」，而是一種價值觀的主張。本書的第七章即利用三份不同年代、不同地方所出版的上海指南，來討論上海認同的競爭性。

1876年葛元煦所出版的《滬游雜記》是最早的上海旅遊指南，作者假設華界部分與中國其它地區無甚差異，遊客所需引導的部分是與中國法律及習俗不同的租界區，因此這本指南所介紹的上海僅限於租界。《滬游雜記》分為四卷，但各卷並沒有明確的中心主題，各條目間也沒有必然的先後邏輯關係，因此比較像是租界各種事物景象的百科全書。根據葉凱蒂的看法，葛元煦的上海是個「沒有中心」的城市，不但中國府衙

不在它的圖像之中，連租界行政中心的「工部局」及「巡捕房」，也只夾在「放生龜」與「客棧」條目之間——這也顯示上海是個「平等」(egalitarian) 都市：在給外地人的指南裡，葛元煦並不特別強調上海某些方面的特徵，貿易、娛樂、宗教、科技等項目都被放在同一平台，任由讀者選取並詮釋上海的特徵。此外，葛元煦的上海是個沒有過去的都市，甚至對「租界」介紹文字中，未曾提及鴉片戰爭；這本指南完全看不到歷史的參考點，更談不上時代的變遷，意味著葛元煦希望讀者只注意「現在」的上海。

葉凱蒂討論的第二本指南是 1884 年吳友如的《申江勝景圖》，這是第一本以圖像介紹上海的指南，由申報負責人美查 (Ernest Major) 旗下的點石齋出版。與《滬游雜記》不同的是，《申江勝景圖》把上海視為一個整體，華界也被包括在內。在吳友如的筆下，上海是個多族裔的社區 (multiethnic community)，這本指南的焦點也放在中國與西方文化的融合及和平共存的景象。不過所選取的「勝景」內容仍反映出對中西文化的價值判斷：《申江勝景圖》首先介紹的是位於華界或與之相關的文化景點，如豫園、會館公所、華人戲園等，作者希望呈現上海居民所引以為傲的事物。至於西洋「勝景」主要指的是先進的基礎建設及技術，如瓦斯、自來水、大型商輪、鐵路等。有趣的是，《勝景圖》未曾出現西洋的戰船，反而有一張訓練清兵的上海教場圖片，顯示吳友如有意將外國人描繪成「和平啓蒙者」的形象。

除了中文的城市導覽外，早在 1860 年代起便出現西文的上海指南，其目的主要向西方企業界介紹上海租界的經濟潛力；而葉凱蒂用以比較的第三本指南則是 1903 年由達爾溫特牧師 (Rev. Charles Ewart Darwent) 所寫的《上海旅遊手冊》(Shanghai: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這本指南同樣以公共建築作為上海景緻的基本輪廓，特別強調上海自開埠以來在各方面的改善，不論是貿易、道路、街景，都呈現「高貴與秩序」(gentility and order) 的昇平景象。達爾溫特並沒有忘記租界以外的部分——他介紹華界時把敘述重心放在雕樑畫棟的中國經典建築 (如園林寺廟)。在他筆下的中西文化不但毫無衝突，這樣的和平共

存是上海能夠發展成世界級繁華都會的基礎；可以說，達爾溫特把上海描繪為「模範租界」的典型。有趣的是，當達爾溫特介紹一個又一個休閒去處時，卻遺漏了四馬路的青樓文化，也刻意略去賽馬活動的賭博性質。也許對這位協和禮拜堂 (union church) 的牧師而言，妓院的鶯鶯燕燕、鴉片館的飄飄欲仙、以及跑馬場的聲光刺激，與他所要建構的模範租界格格不入，儘管它們是上海娛樂文化的重要支柱。

葉凱蒂不但對三本上海指南進行了細緻的文本分析，還討論了書中的三幅地圖（《申江勝景圖》並未附上地圖，葉凱蒂所採用的是點石齋所出版的「上海縣城廂租界全圖」），從作者對上海地圖的選擇性繪製，進一步觀察這些指南如何定義上海的界線與內涵。從城市指南檢視城市認同，是葉凱蒂獨具匠心的創意，她也正確地指出城市認同的複雜性，不是簡單的種族／民族主義能完全解釋的。不過這一章在整本書的位置顯得有些奇怪：前六章談的均為青樓與文人，而這一章所討論的上海指南，雖然成於文人之手，但對寫作指南的文人本身討論得並不多；而對青樓名妓，作者更是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因此本章的論點與本書主旨扣合度並不高。其實這一章除了討論城市認同外，我認為作者可以討論妓院在上海娛樂業的地位與角色：從一開始，作者就先入為主地把妓院定位為上海娛樂業的中心，並順著這個理路強調妓業的娛樂性。但如果把上海指南對妓業的描述放在書的開頭，也許我們對妓業的娛樂中心地位需要重新估量，而各類文人（包括指南的作者）對妓業的紛歧態度可能更明顯，她所要強調的認同競爭性可能更高。

整體而言，葉凱蒂的《情愛上海》相當程度上顛覆了過去對妓女史的研究，賦予晚清上海名妓高度的自主性，她們不但不是沈默的「下屬階級」，還是能主動利用各種媒介讓人聽到她們聲音的「城市新女性」。不過在慶賀女性自主的同時，我仍然感到一絲不安：作者會不會過度樂觀地強調名妓的能動性？而對於我們所較習慣的「悲慘妓女」論述，作者又會以何種方式、擺放在什麼位置？特別是賀蕭與安克強均提出，20世紀青樓文化的「普羅化」，使妓女淪於純粹的性交易者；如果在19世紀末晚清名妓仍然以娛樂文化創造者的姿態出現於公眾眼前，何以風雅

的青樓文化會在20世紀迅速墮落？我想這是走修正主義路線的作者必須面對的問題。